

作家访谈

每当我文思枯竭时,一回到湘西,我的文思就像一粒种子,马上就会苏醒、复活,生根、发芽,长出崭新的青枝绿叶。

彭学明:我的文学与湘西血肉相连

2013年11月3日,当彭学明从新闻里看到习总书记去湘西视察时,他的喜悦和幸福不亚于当时见到习总书记的每一个人。

外不同? 彭学明:是的。一想到是我的家乡,特别是母亲年少时生活的家乡,我的笔尖下流淌的仿佛不是水墨,而是血缘亲情,那些文字立刻就有了一种情调和温度,让我温暖和亲切。

中华读书报:《人间正是艳阳天》写的湘西十八洞的精准扶贫,如此重大的政治题材,您为什么也能写得如此抒情、如此动人?

彭学明:最大和最好的政治是为人的政治,是需要深入人心、深得民心的政治。精准扶贫,就是一件为人的、深入人心和深得民心的政治。在我数次前往十八洞村采访的过程中,跟我的那些父老乡亲彻夜长谈时,我深切感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是如何深入人心、深得民心的,我也切身感受到了精准扶贫政策是怎样给我的家乡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中华读书报:您的语言富有诗

意,有情节,有悬念,引人入胜。在创作技巧上,您有怎样的追求?

彭学明:文学的第一功能就是给人以艺术的审美享受,第二功能就是给人以精神的启迪,第三功能就是给人以心灵的抚慰。所以,在语言上我特别追求语言的画面感、音乐感和诗意,追求语言的弹性与张力。在人物上我特别注重人物的外在形象、内在性格、生活命运和精神品质。在整个构架上讲究情节悬念和带入感、牵引力。

中华读书报:五年间,您先后8次去十八洞走访采访,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功夫?每一次是否都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彭学明:实际上我不止8次到十八洞。这是《人间正是艳阳天》交稿时的次数。实际上我到十八洞已经12次。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功夫?情感使然。对家乡的情感,对文学的情感,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情感。我的家乡一直很穷,但党和政府的成长都会让人对故地产生出非同一般的感觉,所以我会特别乐意回味这个“上海”,它被赋予了诗意和抒情,语言不是写实的,而是诗化了,仿佛蒙上一层风韵悠长的滤镜:“春天跑起来的速度像是一匹马,昂首秋风后,转眼又从冬天折了回来。”

中华读书报:《人间正是艳阳天》的写作中,您收获了什么? 彭学明:最大的收获是,我更加

深刻地认识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作家与人民的关系。文学如果离开了生活,特别是人民的生活,就失去了生命。作家如果离开了人民,特别是失去了人民的欢迎,就失去了根本。在采写《人间正是艳阳天》的过程中,我与十八洞的父老乡亲接触时,我对那种纯朴的、犹如泥土一样真实的人情感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比如,在《人间正是艳阳天》交付印刷之际,我于2018年9月中旬带中国作家协会纪念改革开放40年采访团去了十八洞,我书中写到的龙德成大姐,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到十八洞时与村民进行座谈并提出精准扶贫的那家户主,在跟作家座谈时,谈到精准扶贫给她家和村里带来的巨大变化,哽咽失声,泪眼婆娑,情绪稍微稳定后,居然给我们在座的几十位作家自编自唱了一首民歌。她用苗语演唱的这首苗歌,是说精准扶贫给她家和十八洞带来的变化。村民们说,龙大姐从没唱过歌,这是情到深处!所以,我想说,没有深入到人民中去,你永远得不到最好、最真的素材,不到人民中去,你永远不知道人民有多纯朴、多纯真、多纯粹。

中华读书报:《人间正是艳阳天》这部作品,对您意味着什么?

彭学明:意味着我的家国情怀是水乳交融的。无论家和国,都是刻入骨髓的,所以表达时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我不仅能够写家,比如《娘》,也能够写国,比如这部《人间正是艳阳天》。家事好写,国情难抒,我能够把精准扶贫这样重大的

国情当做家事去写,正好体现了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国家国家、有家才是国的家国理念,也意味着我的写作才有了另外一个新的纬度和高度。

中华读书报:此前您的散文《娘》影响很大,您的创作技巧和思想的成熟,在《娘》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完整体现。这部感动了无数读者的作品,是怎样完成的?

彭学明:《娘》是敲碎骨头揉成墨写的。是血泪交流写出的。是我与娘的一次对话,是我写给娘的一封信。娘在世的时候,我以为我工作调动到哪儿娘带到哪儿就是孝顺,以为娘跟我住进城来吃好吃好就是孝顺,等娘去世了,当我回忆与娘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时,才知道,我对娘的孝是自以为是,对娘的敬是自以为是,我从没站在娘的立场去设身处地地考虑过问题,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违背娘的意愿,规范娘的行为,绑架娘的意志,使得娘心灵和精神都不怎么快乐,才明白自己并不是一个好儿子,反倒是一个不孝之子。所以,我在《娘》里除了写了娘宏阔无私而又艰辛顽强的母爱外,也写了一个儿子种种对不起娘的点滴小事,真心向娘检讨和悔过。没想到,不但引起了国内读过这部作品的人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国外读者的强烈共鸣,这说明真情产生感动,真实产生力量,真诚产生高贵。

中华读书报:无论报告文学还是散文,您的很多获奖作品都是围绕湘西。您觉得湘西这片土地,给



《人间正道艳阳天》,彭学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68.00元;《娘》(修订版),彭学明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第一版,48.00元

您的创作带来什么? 彭学明:在我的眼里,我的湘西是世界上最美的。自然风光最美,人情人性最美,民风民情最美,爱上了我的湘西,我哪里都爱不上了。湘西有我太多的迷恋和牵挂。湘西给我的创作带来的不仅是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和财富,还有成就、价值和荣光。每当我文思枯竭时,一回到湘西,我的文思就像一粒种子,马上就会苏醒、复活,生根、发芽,长出崭新的青枝绿叶。我常常说,与其说您发自内心的喜欢和赞美的是我的作品,不如说,你喜欢和赞美的是我的湘西。因为,我的文学与文字与我的湘西血肉相连,我的生命与灵魂与我的湘西生死攸关。(夏琪)

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意象是苏州河,少年在桥上被风灌满单薄的衣衫,他踟蹰在上海市的大街上,到大光明电影院看一场有译意风的电影。这是一个并非生活在上海本土的作家创造的世界。

少年和风:乱世中的蓬勃诗意

项静

赵晖与海飞合著的《棋手》是一本关于上海的谍战小说,这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海飞“谍战深海”系列小说第二部。之前我看过海飞先生的小说,也看过海飞编剧的电视剧《麻雀》,这三者之间有相似的生意在生长和延续。首先吸引我的是其中鲜明的上海意象,在小说创作中,作者的智慧一般首先会转化成意象的形式,在叙述中呈现出来。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意象是苏州河,少年在桥上被风灌满单薄的衣衫,他踟蹰在上海市的大街上,到大光明电影院看一场有译意风的电影。如果再加上百乐门、静安寺、北京西路的邮局,它们就会自己生长成一个琉璃

世界。这是一个并非生活在上海本土的作家创造的世界,就像沈从文笔下的神秘土地湘西,是在他离开湘西之后所创造的。距离和人生的成长都会让人对故地产生出非同一般的感觉,所以我会特别乐意回味这个“上海”,它被赋予了诗意和抒情,语言不是写实的,而是诗化了,仿佛蒙上一层风韵悠长的滤镜:“春天跑起来的速度像是一匹马,昂首秋风后,转眼又从冬天折了回来。”

与诗化的意象相对的,是乱世,是孤岛时期的上海,社会局势内在的矛盾和紧张,各种社会势力的角斗,让这种诗意有一种悲伤的

底子。就像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即使她是那么热爱中国的日夜,迷恋日常生活的物质,都难免有一种在时间悬崖上的感觉。这种诗意于是具有了人生哲学的况味。在乱世的底色中,人物的少年性跃然纸面,像我们总爱说的,愿你归来仍是少年。主人公贺羽丰这个浙西少年正处在最生猛的年纪,他就像周璇的歌声中所唱的,胡天胡地,蹉跎着青春。他无意中卷入与家国大业有关的滚滚洪流中去,成为地下党员,在剑拔弩张的谍战生涯中经历九死一生。而外表上,他看起来就是一个风中少年,一个天才棋手,战战兢兢地走上革命道

路,来到大城市,在脚踏车上戴着墨镜,吊吊郎当地扮酷。很多时候,我们能把握珠宝写好后,但我们无法写好珠宝长大后之后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少年们被生活严苛以待,危险得仿佛随时会丢掉性命,同时也被单纯地对待,比如少年们的爱情。贺羽丰爱上了自己已刺透对象的情人顾晓晓,她的热烈吸引着,但永远处在一种临界状态,好像这个乱世永远不会给他们机会。再比如那个天真的译意风小姐阿苏,曾经也强烈而纯净地爱过他。阿苏常常要跑上一段远路去,去走廊尽头的洗手池,贺羽丰曾经问她,你这是干吗?阿苏说,你不晓

得?那里有冬天里免费的阳光呀。阿苏是如此留恋世间的温暖,也毫无保留地给出了自己的温度。最后要说,特别喜欢小说里人物的职业设计,天才棋手,译制片翻译,这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神秘的职业,天然为人物构建起一个可以隐藏很多东西,也能创造很多故事的人生空间。略有遗憾的是里面关于棋手的部分,其涉及专业性的内容不是很多,可能对很多棋手读者来说这是不充分不到位的地方。痴狂的嗜好对人物来说非常重要,现实生活中我们认同人无暇不交,而在虚构维度里,人物没有一些特殊的道具可能也很难成立。这样各有



《棋手》,海飞、赵晖著,花城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38.00元

癖好的人物一步一步加入长河小说中,他们成长、深化、回望,携着秘密隐没在人群,等待着下次再碰面。而《棋手》中,我们永远能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意象:少年和风,构成了乱世中的蓬勃诗意。

战后女性通俗小说家的创作,以带有传奇性的萨冈和文化背景独特的诺冬为代表,不断掀起高潮。她们作品的影响已经完全超越了文学的范畴。

从萨冈到诺冬:战后法国女性通俗小说的转变与发展

段慧敏

弗朗索瓦兹·萨冈(1935—2004)与阿梅丽·诺冬(1967—)是战后法国通俗小说界的两代“畅销女王”。这两位作家人生经历不同,创作风格迥异,却同样创造了各自时代多产而畅销的奇迹。萨冈留下了23部小说作品,其代表作《你好,忧伤》全球畅销500万册,缔造了法国畅销书的神话;诺冬的作品常居法国畅销书榜首,被译为四十余种语言,2018年刚刚出版第27部小说的诺冬,仍计划在每一年的文学书潮中推出新作。作为法国战后女性通俗作家的杰出代表,两人的创作呈现了法国战后女性通俗小说发展的诸多特色,从不同侧面集中展现了女性通俗小说创作在主题、内容、思想等方面的转变与发展。

诺冬的解答方式是其中最特别的一种:在《幸福的怀念》中,诺冬以“见性”这一佛教用语对自己经历的忧伤与不幸、痛苦与失去进行阐释。在佛教中,“见性”是见到一切众生普具的佛性,见佛性者,当下与诸佛无异,禅家名之为“见性成佛”。诺冬在小说中所提到的见性,即主人公阿梅丽重新感觉到的一种“虚空”。“重新感觉到虚空,亦即通过五种感官体验空阔。非常奇妙。在欧洲,这会让人想到冥想、阴暗,得不到安慰的人;在日本,我只是无婚约,非明亮,这一切无需安慰。虚空里没有圆满。”诺冬认为,见性是希望状态的一次呈圣,在这里,我们毫无障碍地处于绝对的现在,处于永恒的禅定与极乐之中。”诺冬并不是通过“他者”来解除困扰,而是通过“见性”的顿悟达到与“自我”的和解。

诺冬的“见性”思想,实际上是小说创作的重心从“他者”到“自我”的转变,这也是战后女性通俗小说家写作发展的一大特色。这与战后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性意识的觉醒不无关系。战后女性逐渐走出家门,踏入职场,这一方面使女性经济获得自由、地位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也使现实生活中心女性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与心理压力,种种压力已经超越了萨冈冠以“忧伤”之名的感受。此时女性通俗小说家的写作,多以自身经验、女性视角对这种女性的现实困扰进行探讨,其关注重点从“他者”与外部世界转移到“自我”与女性的内心,这种关注,同时也引导女性的独立与成熟。例如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安戈在作品《天上的目光》《不可能的爱情》中都描述了在各种压力之下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萨冈的孤独带来的“忧伤”,还是诺冬通过自省领悟的“见性”,都见证了战后女性通俗小说家在作品思想性方



弗朗索瓦兹·萨冈



阿梅丽·诺冬

面的努力与追求。

写作题材:从“言情小说”到“多面创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的言情小说逐渐衰落,萨冈在这一时期出版了第一部回忆录,开始回望人生,文学创作逐年递减,她在作品中擅长的“三角恋情”“孤独忧伤”等主题,都不再受到新一代读者的追捧。传统言情小说中纸醉金迷的生活,荒诞滑稽的两性等主题无法适应社会变化中读者们新的阅读期待,逐渐成为了祖母的老花镜毫无新意可言。众多通俗小说家都在寻求新的突破,探讨新的题材与写作路径。也正是这一时期,法国女性作家写作题材,都不通俗小说家自身的写作才能,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随着新时代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获取方式的多元化,作家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多样

她们在侦探小说的创作中进行了全新的尝试,给读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接连斩获侦探小说各类奖项。诺冬的处女作《杀手保镖》和《谋杀》等作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产物,2015年出版的《内维尔公爵之罪》,也同样具有浓厚的侦探推理色彩,以至于在早期的研究中,有人将诺冬的创作归于“黑色小说”。但是随后诺冬创作主题变化多样,既有从欧洲传统童话故事获取灵感,以同名小说致敬传统的作品《蓝胡子》(言情小说中纸醉金迷的生活,荒诞滑稽的小说的自传作品《彼得罗尼耶》《谨慎戒忍》等,还有描述爱情的《闻所未闻》《冬之旅》等,有探讨社会问题的《午后四点》(独断)等,可谓是通俗小说创作的“多面手”。

诺冬“万花筒”式的多变创作题材,一方面印证了小说家自身的写作才能,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随着新时代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获取方式的多元化,作家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多样

化的小说创作与日新月异的写作方式正是这种变化的客观反映。战后法国女性通俗小说家群体的创作几乎涉及了通俗小说的各个领域: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社会小说,甚至战争小说等,其中有想象奇特的玛丽·达里奥塞克、有充满哲理的妙莉叶·芭贝里、有善于观察的安娜·加瓦尔达,有强调女性意识的波尔·贡斯坦,她们的代表作《母猪女郎》《刺猬的优雅》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心心相诉》等都得到了不同类别文学奖项的桂冠,这也说明女性通俗文学作家的创作在“百花齐放”的同时,又做到了量质齐升。

身份意识:从“出口商品”到“无国界写作”

马尔罗曾将萨冈的小说与皮雅芙的歌曲、香奈儿五号并称为“法国三大出口商品”。萨冈小说被贴上了商品性、大众性、消费性的标签,萨冈的成功也就成了她典型的“made in France”的传奇,萨冈的作品与其本人的传奇相互纠缠,相映成趣。对于五六十年代很多国外读者来说,萨冈成为了“法兰西”的代名词,她作品中青绿的外省乡间、光怪陆离的巴黎午夜、无拘无束的恋人、悠长缓慢的假期,不可名状的闲愁等描述,丰富了人们对法国的浪漫想象。

诺冬是比利时人,用法语写作,长期居住在巴黎,却用一部又一部作品描述她的出生之地日本。《管子》的玄思、《谨慎戒忍》《闻所未闻》等作品,都不通俗地将她在日本的童年、爱情与“成为一个日本人”的执念呈现出来,构成了诺冬的“日本系列”。这一系列作品以精彩的故事、真挚的情感多次获得各类文学奖项的青睐。

但是在2013年《幸福的怀念》后,诺冬开始放弃与其“身心分离”的日本主题,逐渐回归到欧洲的文化认同中。诺冬最终在欧洲与日本两种文化身份之间找到了一种妥协的方式,称自己为“无国界作家”。

两位通俗小说家文化身份的不同特色,印证了战后法国社会多元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战争使欧洲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人口迁徙与融合,战后法国经济的发展又加速了全球性的人口流动。与此相呼应,法国文坛上出现了多族裔创作、多角度思考文化身份的新特色。心系阿尔及利亚的加缪、不断回望湄公河的杜拉斯、讲述布拉格故事的昆德拉、传播中国文化经典的程抱一,都成为了法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作家。在通俗文学领域,除了来自比利时的诺冬,还有来自摩纳哥的蕾拉·斯利玛尼与妙莉叶·芭贝里,来自中国的山飒等女性作家,这些外籍作家在法国的创作,给法国通俗文学带来了浓厚的异域风情与强烈的历史、文化对撞。

战后女性通俗小说家的创作,以带有传奇性的萨冈和文化背景独特的诺冬为代表,不断掀起高潮。她们作品的影响已经完全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延伸到了戏剧、广播、电影、漫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与大众文化领域。在关注到女性通俗小说家大众影响力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教育界与学术界对于通俗文学的态度也悄然转变。萨冈与诺冬以及其他女性通俗小说家的作品不断被收入法语课本,研究女性通俗小说的博士论文也已屡见不鲜。《你好,忧伤》更被列入《世界报》读者评选的“二十世纪百部小说”。这些现象都说明了战后女性通俗小说已经逐渐开始了其“经典化”的进程,且终将在当代法国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